《亲爱的》：孩子被拐”的痛与思

本报记者 蒋肖斌 蔡梦吟

与《心花路放》的戏谑、《黄金时代》的文艺范儿相比，“十一”期间热映的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亲爱的》以当下现实社会“打拐”题材为主线，把残酷进行到底。电影根据一则真实的“打拐”新闻改编，讲述了以田文军为代表的一群父母，在孩子被拐后不懈寻找，和孩子“养母”李红琴争夺孩子的纠结故事。孩子找回后，本该是大团圆的结局，却因为孩子只认“养母”不认亲妈，又陷入了一个情与理的困境。

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三个与《亲爱的》关系密切的人。

记者邓飞曾陪伴和帮助电影主人公田文军的原型彭高峰寻找孩子。他说：“我硬下心肠告诉你，我不同情所谓‘养父母’，没有买，就没有拐卖。”心理学家李雪漫在看完电影后说：“如果孩子对‘养父母’有较深感情，强行分离同样是对孩子的伤害，应允许养父母进行适度探望。”《亲爱的》编剧张冀说：“孩子已经把‘养母’当成母亲，被救后形同‘二次拐卖’。电影最后我设置了开放式结局，因为真相是复杂的。”

《亲爱的》剧照，人贩子妻子(赵薇饰)与“领养”的两个孩子

“必须呼吁‘买拐同罪’”

《亲爱的》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2008年，在深圳开电话超市的彭高峰因为儿子彭文乐被拐走，踏上了漫漫寻子路。2010年9月27日21点，记者邓飞在微博上贴出彭文乐照片，并写道：“互联网能再次创造奇迹吗？请帮助彭高峰找到他的儿子彭文乐。”这条微博到2011年春节已经被转发了6000多次。2011年2月，一名看过微博的大学生在回乡时，偶尔发现一个酷似彭文乐的孩子，连忙打电话给彭高峰。当月25日，彭高峰找到了儿子。

邓飞在陪彭高峰去救孩子时，看到孩子的“养母”一直在哭。“我当时心里也很难受。但理性告诉我，不能同情她。一个孩子被拐卖，打碎的是很多人的命运和幸福，至少直接让3个家庭痛不欲生——夫妻的小家、双方父母的家庭。任何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邓飞说。

作为“网络打拐”第一人，邓飞认为，现在打拐的最大困难在于，社会对买孩子的人宽容甚至同情。“舆论会认为没有孩子也很可怜；法律不能对买孩子的人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在侦办案件时，无法对买孩子的人予以处罚。”邓飞说，“我们必须呼吁、推动‘买拐同罪’。只有消除买方市场，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拐卖儿童的罪恶。我呼吁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

《亲爱的》中，一个孩子获得解救后被送到了福利院，十分思念“养母”李红琴。李红琴也希望能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对此，邓飞坚决地说：“不能把孩子交给‘养母’，否则就是纵容更多人去买孩子。虽然这对孩子比较残酷，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孩子的亲情，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只能硬下心肠，斩断买主的手。”

邓飞的设想，是“在相关法律出台之前买了孩子，在国家规定期限内交出孩子，就可以免于刑事责任；如果拒不交出，或继续买卖，一经查出，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被拐孩子离开“养父母”面临二次伤害

彭高峰曾帮助一个家长找到女儿，小姑娘丢的时候不到3岁，被找到后已经7岁，一直不肯认亲生父母，哭着要回“老家”。就如同电影里演的，孩子对警察说：“他们(亲生父母)是坏人，你们把他们抓起来。”彭文乐在回到父母身边后，也不止一次地说想念“养母”，还说自己要赶紧长大，攒钱给“养母”用。

青少年心理学家李春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孩子的认知能力要到6岁后才逐渐发展成型，对人和事能有清晰的记忆和定位。3岁之前的记忆更多是一种感觉和氛围。电影中孩子被拐的时间恰好是3岁，所以更多认“养母”为母亲，甚至不愿与亲生父母相认。

李春漫说，找到孩子并非结束，而是开始——需要对孩子进行两方面的心理治疗。一是被拐卖时造成的心理创伤；二是被找回时与“养父母”分离的创伤。“这不仅需要亲生父母的配合，如果条件允许，也需要‘养父母’的配合和支持”。

李春漫说：“从法律角度，孩子是否能与‘养父母’接触，须由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决定。从心理和情感角度，强行分离，同样是对孩子的伤害，应允许‘养父母’进行适度探望。给孩子一个过渡期，使孩子在心理上逐渐由与‘养父母’的依恋关系，过渡到与亲生父母的依恋关系。”

李春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孩子被拐后，父母的反应会经历3个阶段：应激期(几小时到几天)，可能是强烈焦虑，也可能是麻木的；痛苦期（几周到半年），这是最痛苦的阶段，悲伤、愤怒、焦虑、失望、思念……各种情绪交杂；恢复期，此前的情绪仍然存在，但已经逐渐接受现实。李春漫说：“电影中的男主角就卡在了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幸好他找到了孩子，否则可能面临全面崩溃。”

在以往的新闻报道或者文艺作品中，一般只关注丢失孩子父母的痛苦，而《亲爱的》把所谓“养父母”的痛苦也摆到了明处。李红琴在电影后半部分的催泪效果，一点也不亚于前半部分的田文军。

李春漫认为，电影对“养母”形象的刻画，不再把她简单地定义为“违法者”，而看到了背后的人性。“对于亲生父母而言，失去亲生骨肉，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其他人无法体会。而就‘养父母’家庭而言，失去孩子同样痛苦，而且痛苦未必比前者小。这取决于这些特殊的父母对孩子倾注的情感与相处的时间。”李春漫说。

每个人的自省将推动问题的解决

有观众认为，电影至始至终没有直接出现人贩子的形象，是作者放弃了“道德立场”。为此，编剧张冀解释：“其实《亲爱的》的道德立场在开篇就已经摆明。人贩子给孩子亲人带来的毁灭性痛苦，在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明确。但这部电影不想只满足于简单的二元对立。”

张冀称，这是他近年来遇到的唯一一部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现实题材”的电影。电影中开小店的父亲、富裕的母亲、卑微的农村妇女、不求上进的律师，这些不同阶层的人面对“打拐”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观念和应对方式。

张冀说：“现实题材最终要回归到人性。人性在困境中会闪烁出光芒。那个不顾一切寻子的父亲，和前妻从误解到沟通，体现了人性的温度；为了自己的女儿——虽然法律意义上不是她的女儿——赵薇扮演的农村母亲表现出了坚持、奋斗、母爱，也是人性的光芒。我愿意看到不同阶层的人们最后达成和解，或者至少看见朝向和解的方向。”

2011年春节期间，“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仅开博10余天，就吸引了57万多名网民参加。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微博回应：“我会通过微博和大家保持沟通，欢迎提供拐卖犯罪线索。对每一条线索，公安部打拐办都会部署核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

张冀说：“制止拐卖儿童，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政府需要不断推进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但我从艺术的、人道的角度看，每个人的自省、改变，终将推动问题的解决。”

《亲爱的》电影海报

外语普及了，文学翻译为何没有大发展

翻译家：以商业逻辑很难做好文化

林智仁 本报记者 陈 强

“当下那么多人在学外语，为什么难以出现大量优秀的译著？我国当下还能出现像林纾这样的翻译大家吗？”这是中国翻译协会理事、译林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在10月11日福建工程学院举行的林纾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

林纾是我国近代文学家和翻译家，其代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蜚声中外文坛。他还将外国180多部长、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文学的窗口，成为举世公认的“译界之王”。除译作外，林纾还著有大量的小说、诗、词、曲、传记、画论，留下了千幅画卷。

“林纾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但我今天想抛开这个谈谈研究林纾在当下的意义。”李景端指出，前段时间国家版权局制定了新的文字作品报酬办法，其中原创作品每千字的稿酬是80~300元，而翻译的稿酬标准只有50~200元。“这说明在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中，翻译依然是处于附属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对于有些人所说的“只要会外语，就能搞翻译”的观点，李景端并不认同。在他看来，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翻译。“林纾并不懂外语，他翻译作品的方式是靠和他人合作，由他人口译之后自己笔述的，可见他文学修养之深厚，其专注、认真和刻苦的精神让人敬仰。”他认为，“翻译是属于再创作，需要文学底蕴、理论基础、艺术灵感的结合。但其稿酬却远不及原创作品，这显然不合理。”

据李景端介绍，过去翻译一本书的稿费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但现在恐怕连一平方米都买不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译者，特别是年轻人从事文学翻译的积极性”。

专程前来参加此次研讨会的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庄柔玉对此也深感忧虑。在教学过程中，她发现，学生对于翻译中的同声传译很有兴趣，但对文学翻译就不甚青睐。“同声传译的市场行情是按分钟计价的，收益高。在很多具备专业技能的人眼中都是不二选择。但是一听到文学翻译，许多人就兴趣不大。”

她还注意到，文学翻译的作品在内地高校不能算科研成果。一些掌握翻译能力的高校教师为了评职称，不得不“扬短避长”转而写专著、发论文。这说明有关方面在晋升机制的设计上并不鼓励文学翻译。

作为翻译出版界的前辈，李景端对于时下一些重速度、不重质量的译作表示费解。“比如《乔布斯传》只用35天就出版，有些畅销书的中文译本甚至在原著发布的同时上市。为了赶在最有利于销售的时机推出图书，出版社就抢速度找多人翻译。结果必然导致作品在文笔风格、前后统一方面不协调。这种流水线式的作业方式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

他认为，在高度市场化的当下，出版社选择翻译一些读者关注的快餐式图书未尝不可，“但这不应该是翻译行业的主流。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不能被忽视。实际上，完全以商业的逻辑很难真正做好文化。所以翻译事业应先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吸引人才。”

在学术泰斗季羡林2004年当选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后，李景端曾去函就翻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季羡林回复说：“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的规律，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翻译应该成为社会需要、受人尊重的职业……现在大学里只把翻译当作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就自然会搞翻译了。不是这样。要从改进大学里翻译的教学入手，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使翻译后备队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译专业训练。”

季羡林还谈到了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比如说，高校中翻译不能算科研成果，这样一刀切是否合理？能否区分一下哪些算哪些不算。翻译报酬，现在搞口译的，有的高得离谱，而搞文学翻译的，每千字还是几十元，显得太低了。政协开会，这个界、那个界多得很，惟独没有翻译界，不在乎多少名额，列上这个界，也体现了对这一行业的重视。译作因为都是根据原作派生的，因此，被人抄袭以后往往由于侵权文字难以认定而使译者维权产生困难。”他认为，“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或者是填补空白的，就需要通过政府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

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3所院校开办翻译专业试点。2007年，又开始培养翻译专业硕士，至今已有160多所院校招收翻译专业硕士。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张旭教授建议，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翻译人才，大学外语系应适当增加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了解，而不单单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外语翻译的技能。

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呼吁，对于文学翻译应建立一套相关的评审评估体系，给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以及优秀的译者应有的承认。“只有社会真正重视翻译这个行业，给予译者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文学翻译的行列中，好的译者和译著才会越来越多。”李景端说。

金鹰节：评奖的苦瓜牵连着创作的枯藤

大家说话

李晓亮

10月12日晚，演员王洛勇、刘涛分封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以下简称“金鹰节”）“视帝”、“视后”。“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则由张嘉译、孙俪摘得。

本届金鹰节照例又是风波不断。有网友对开幕式主持人谢娜“读书少、没文化”的调侃——结果颁奖闭幕式上，谢娜就坡下驴，抱本儿书就出来了。当然，也避嫌没再主持。

不过既然是评奖，主持人尚是其次，关键是得奖的演员。如若与业界口碑及观众观感大体一致，自然会有跟风好评。女主孙俪，凭一部《辣妈正传》拿奖拿到手软；男主张嘉译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大叔型男。这两位获奖，算是众望所归。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视帝”王洛勇。这个名字对年轻人来说，恐怕较为陌生，他这次凭借《焦裕禄》获奖。除此，另一个更狠的“观众最喜爱男演员奖”颁给《长白山下我的家》的陈逸恒——不管片名还是人名，仅是想让人记住就显得过于凶残。还冠以“观众最喜爱”之名，这到底是褒奖还是示众？

张嘉译是凭《营盘镇警事》获奖的。这部评分高达8分的片子截至发稿时，豆瓣“看过的”也不过五六百人。瞧，连红得发紫的张大叔，都不是靠市场说话的热播剧获奖。“金鹰节”并非殿堂级学院派的学术评奖，那么这种“观众最喜爱”实则是“观众最脸盲”的尴尬错位，基本没有考虑民意含量和民众智商。

类似评奖又何止一个电视节？《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曾这样评价日益畸形的各种评奖活动：“对比着奥斯卡和金鸡、百花，艾美和飞天，诺贝尔和鲁迅文学奖，普利策和范长江……人家有游戏规则的，我们只有游戏，没有规则……”

归根结底，文艺创作的环境和作品质量才是评奖根本。“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为啥层出不穷？“宫斗”、“穿越”的古装剧何以不休不止？婆媳过招的“作”片何时到头？拼猎奇、拼收视的媚俗之作终究赢得不了观众的心。同时，近日，有群星版“监狱风云”，又有劣迹艺人的“封杀令”，当前文艺生态，令人心生忧虑。

国庆期间，有人带孩子看《心花路放》，称这种以艳遇之旅为卖点的片子，是当前电影混乱的佐证。说实话，市场最有话语权。《心花路放》近乎一天1亿元的新纪录，令人不得不服。虽非唯票房论，但要说市场认可的真那么差，也值得商榷。

创作土壤贫瘠且受限重重，无养分的“枯藤”就只能结出畸形病态的“苦瓜”。如果还想让奖项有公信力，只能让创作汲取丰富营养，并释放出艺术创造的能量。

我认为，要说影视方面的政策佑护和针对性引导，在某些方面也有可作为空间。一直口碑爆棚、致力打破国人动画“低幼化弱智化”思维定势的动画大电影《魁拔》系列，三年三部曲票房却一直不给力，日前片方发布《魁拔4》暂停制作的消息。但这三部，不论人物设置，还是叙事能力以及视觉风格，比近来创动画票房新高的《泰时明月》和《龙之谷》都还略胜一筹。如此优秀的探路角色，却因种种原因倒在拓疆路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对中国影视而言，在政策资金扶持和奖项鼓励方面，仍有施展的空间。

不看雾霾 只听音乐

第17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蔡梦吟**）今年是德国音乐大师理查·施特劳斯诞辰150周年。10月9日，第17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以“幻·响——理查·施特劳斯在北京”为主题拉开帷幕。来自施特劳斯故乡的慕尼黑爱乐乐团为观众献上包括《唐璜》、《唐·吉诃德》等多部管弦乐杰作。本届音乐节将持续至10月31日。

由于原定率团来华演出的慕尼黑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洛林·马泽尔不久前逝世，“临危受命”的拉脱维亚指挥家安德里斯·波嘉表示：“我知道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世界古典音乐界的位置举足轻重。与慕尼黑爱乐乐团合作，一起为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做开幕演出，对我而言是巨大的荣幸和责任。”

施特劳斯的16部经典管弦乐作品，将在音乐节期间相继上演。此外，两部施特劳斯的歌剧《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岛》、《艾莱克特拉》也将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正是2008年的第1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引进了《玫瑰骑士》，实现了施特劳斯歌剧在中国的首演。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艺术总监余隆表示，音乐节将持续担负“拓宽中国观众音乐视野、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余隆笑言，在糟糕的天气里，“不看雾霾、只听音乐”或许能让人高兴起来。

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等世界顶尖交响乐团将先后登台。其间，还会举办中国民间原生态音乐会、儿童音乐会、跨界融合音乐会以及民族音乐会等。

音乐节在坚持惠民票价政策之余，将举办系列公益教育活动，以大师课、周末家庭日等活动形式，让高雅音乐走进普通人家。

诗，让打工者听见！

深圳举办“第一朗读者”多媒体诵诗活动

本报记者 桂 杰
实 习 生 吴雪阳

近日，融合诗歌、戏剧、音乐与视觉艺术的深圳文化品牌活动——“第一朗读者”第三季在深圳中心书城举办。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近年来，不仅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也诞生了这样一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标性名片。

从2012年秋天始，“第一朗读者”运用多媒体的表现形式，开创了“诗剧场”新形式。历经两年，它以其独特的视觉、听觉、思想冲击力，在深圳及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国内新诗传播的跨界艺术样式。“第一朗读者”不仅让诗歌走进咖啡馆，也让更多普通市民、打工者听到、看见诗歌。

自1999年起，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编剧、诗人从容，就带领她的团队开始进行诗歌与戏剧的跨界探索。日前，记者采访了从容。她说：“深圳是充满诗意的城市，我们的行动同样充满诗意。”

中国青年报：“第一朗读者”通过话剧手段，把诗歌推向公众视野。创意从何而来？

从容：我与诗歌的跨界实验与探索可追溯到1999年。那时，为庆祝深圳成立20周年，要做一台以诗歌为主要形式的纪念晚会。我们尝试把诗歌做成有一定的戏剧情节、有人物贯穿的朗诵形式，然后运用了多媒体及艺术手段，如，小提琴、二胡、钢琴等，配有舞者，加之戏剧场景，形成一出多媒介联袂的艺术盛典。

中国青年报：“第一朗读者”读诗活动的主题是“深圳为你读诗”？

从容：多年来，诗歌跨界传播活动中我们融入先锋戏剧和当代艺术。现在“第一朗读者”把诗歌还原到戏剧中，把戏剧还原到身体活动中，把身体还原到生命的场域中。

艺术家置身于今天的文化环境，其作品必然要反映出21世纪的现实特征。在诗歌活动中“演诗”环节所体现的，就是与古典艺术和近代艺术不同的现代艺术。它的突出特征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

中国青年报：诗歌的这种朗诵形式，能否赢得普通市民、打工者的欢迎，还是依旧局限在诗歌的小圈子里？

从容：“第一朗读者”尽可能地走进咖啡馆、中心书城、广场。我们期待的目标是，让公众能够因朗读听见诗歌、因戏剧而看见诗歌、因音乐而热爱诗歌、因点评而领悟诗歌。我们的初衷是，希望普通市民和打工族也能进入诗歌的高雅的殿堂，提升城市的精神品位，打造城市的文化名片。通过我们的表演者唱诗、演诗、评诗、读诗等环节，拓展了当代诗歌的立体呈现方式，让公众在场体验、感受、参与，全方位领略当代诗歌的审美妙义。

中国青年报：为使诵诗“更好看”，还请来了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来进行编导？

从容：我们力争对诗歌做进一步的探索，也因此有了“第一朗读者”这个品牌。第一届、第二届“诗剧场”分别是“我听见深圳在歌唱”和“穿越百年”的主题诗剧。《穿越百年》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使诗真正走近大众。“第一朗读者”是我经过经过长时间的实验、思考和准备而产生的。

中国青年报：“第一朗读者”预算是多少？政府支持这一项目的理由是什么？

从容：深圳市委宣传部有文化基金扶持有创意的文化品牌，“第一朗读者”这个项目提出来之后，当时就被市委宣传部基金办的专家审批通过。很多台湾、澳门、香港诗人来到现场，都很佩服深圳政府部门的眼光。

深圳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城市，也是移民性的现代化前沿都市。正因为有这样的大环境，“第一朗读者”才应运而生。如，2013年，“第一朗读者”第二季在中心书城成功举办，就在于这座城市和市民的特殊性。中心书城的场合来的听众基本上都是来休闲的市民，深圳最早提出来就是让大众享受文化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什么文学，需要什么诗歌，需要什么传播形态和各个环节的产生，正好深圳做了一个回答。

中国青年报：“第一朗读者”的活动还有那些地方需要完善？

从容：在诗歌中寻找跨界的规律，是我所注重的。并希望能将其推向更广阔的舞台，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能感受到这种艺术的魅力。期待深圳乃至全国有更深厚的文化情怀、更深远的文化眼光，参与到城市文化建设上来，给予“第一朗读者”更多的支持。

蔚观一周

林 蔚

“劣迹艺人”遭封杀消息证实

有吸毒、嫖娼等行为的“劣迹艺人”将遭封杀的消息日前得到证实。国庆节前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正式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坚持正确导向，不得邀请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参与制作广播电视节目；不得制作、播出以炒作演艺人员、名人明星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看点、噱头的广播电视节目；暂停播出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广告节目等。大部分网友对“封杀”通知表示赞同，也有部分人认为，“封杀”宜有期限，应该给改过自新的艺人一个机会。

点评：“封杀令”能否遏制娱乐圈近来层出不穷的丑闻？我们且拭目以待。

名导师硕士班开班

北京师范大学首届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班日前开班，通过考试选拔，共招收了10名创作方向的学术型硕士，聘请莫言、李敬泽等当代著名作家为导师，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创作，希望经过3年的精心培养，使他们成为未来文学创作的新锐力量。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表示，创作的训练和教育对于文学创作者十分重要，具有写作经验的校外导师责任重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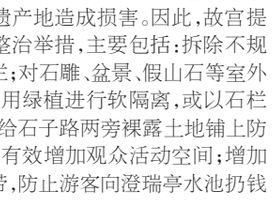
点评：名家能否通过名师训练培养，是个值得探讨并需要时间验证的深奥问题。不过，名师教育或能带来新的头脑风暴，效果令人期待。

内地无明星？

“14亿人却产不出一个明星，更别说我的老友张国荣这样的巨星!自己国家没有明星，只剩一堆脑残青少年狂追无营养的韩星，某些韩星靠一部戏就在中国挣走好几个亿，而中国的年轻艺人一点都不争气!悲哀!”香港娱乐圈明星导师许愿日前发微博，批评中国内地演艺圈缺乏明星，引发舆论热议。赞同者认为许愿一针见血。反对者认为，许愿的观点过于偏激，内地有号召力的明星不少，追韩星也不代表“脑残”。许愿随后发长微博，称当下大陆娱乐圈各种快餐式节目不断推出新艺人，利用短期效应挣钱，却缺乏具有人格魅力、可以指引一代人的真正明星。

点评：时代不同，造星模式不一样，明星的定义也不一样。言论虽然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但内地长期缺乏国民偶像也是不争的事实，值得反思。

谢娜主持惹争议



第十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晚会上，朱军、何炅、汪涵和谢娜担任主持。作为唯一的女主持人，谢娜的主持功底却遭质疑。有网友批评其“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还建议“平时别只顾在微博自拍修图自称女神了，没事多看看书总没坏处的……颁奖礼这样大场合能少来就少来吧”。不少网友认为，颁奖礼和综艺节目不一样，谢娜应该多向其他几位主持人学习。但也有粉丝站在谢娜这一边，认为人各有专长，不应苛求主持人统一风格。

点评：赞同主持人保持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分场合。亦庄亦谐，对主持人而言并非高要求。

故宫博物院院长出言治理御花园

本报讯（记者**张黎姣**）日前，在停喷20年后，故宫御花园堆秀山前水法景观重现昔日美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为彻底解决御花园观众拥挤、蹲坐用餐、攀爬假山等状况，故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体提升园内景观效果和参观环境。并以大量减少现代园林景观方式，使御花园重新找回古典园林之美。

作为故宫多数观众参观的最后一站，御花园在观众流量高峰时段，往往都会成为故宫博物院最大的“堵点”之一，不但严重影响观众参观的氛围，更会对故宫世界文化遗产地造成损害。因此，故宫提出一系列整治举措，主要包括：拆除不规则的铁护栏；对石雕、盆景、假山石等室外文物，或采用绿植进行软隔离，或以石栏杆作围挡；给石子路两旁裸露土地铺上防护透水板，有效增加观众活动空间；增加景观隔离带，防止游客向澄瑞亭水池扔钱币；撤除御花园内所有售卖食品的商铺，维护古典园林文化氛围；增加路椅，让观众更有尊严地休息等。